

鲁迅文艺思想散论

肖荣 陈坚



I210.97/79

鲁迅文艺思想散论

肖荣 陈坚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14933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78·杭州

714933

6701/20

鲁迅文艺思想散论

肖荣 陈坚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1/2

1979年5月第一版

197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0

统一书号：10103·86

定 价：0.39元

目 录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	(1)
——鲁迅关于文艺的任务和特点的论述	
“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	(17)
——鲁迅关于人物典型化的论述	
“题材，我看还该取得广大”	(35)
——鲁迅关于题材的论述	
“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	(46)
——鲁迅关于文艺批评的论述	
“弃去蹄毛，留其精粹”	(59)
——鲁迅关于正确对待文艺遗产的论述	
“以独创为贵”	(79)
——鲁迅关于艺术独创性的论述	
“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	(90)
——鲁迅关于文风的论述	
“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	(103)
——鲁迅关于作家世界观改造的论述	
鲁迅文艺思想的发展	(120)
摧毁旧制度的战斗号角	(138)
——斥姚文元对《呐喊》、《彷徨》的歪曲	

刺向敌人的匕首和投枪…………… (153)

——斥姚文元对鲁迅杂文的歪曲

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功绩不容抹煞…………… (162)

——斥“四人帮”利用鲁迅鼓吹“文艺黑线专政”论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

——鲁迅关于文艺的任务和特点的论述

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毛泽东早就作了明确而科学的解答。鲁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以后，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作了深刻而精辟的论述。“四人帮”出于反革命政治需要，故意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鼓吹什么“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在思想理论上制造混乱，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今天，重新学习鲁迅关于文艺的性质和任务的论述，对于彻底批判“四人帮”反动的“根本任务”论，有着重要的启示。

—

鲁迅对于文艺的性质和任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随着他的思想的发展和深化，他的文艺观点也从战斗的唯物论逐渐接近并最后达到以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水平。他在后期对文艺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的阐述，正确地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所指示的原则。

在鲁迅前期的文艺思想中贯串着一根红线，即认为文艺是“改革社会的器械”，要为现实斗争服务。鲁迅从一九〇七年开始文学活动起，就把文学作为反封建的斗争武器。他在《摩罗诗力说》中，热情地赞扬几位欧洲积极浪漫主义作家“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爱国诗歌，希望中国能出现有反抗性的“精神界之战士”。以后，他曾多次谈到那时自己对文艺的认识：“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①，“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②鲁迅从事文艺事业，目的就是要用文艺作为提高人民觉悟的有效工具，来改造社会。在当时，这种文学观点是进步的，它继承和发扬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虽然时代还没有给鲁迅准备这样的条件——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性质和功能，但他这时的认识同将小说看作消遣的陈腐的封建主义文学观点，与时髦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文学观点相比较，是要高明得多的。鲁迅曾明确地说过：

“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③十月革命爆发了，“新世纪的曙光”照亮了半封建半殖民地黑暗中国的夜空，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鲁迅预感到拆毁旧中国的“铁屋子”有了希望，在革命先驱者的鼓励和支持下，毅然拿起文艺的武器，发出了战斗的呐喊。他猛烈地揭露和抨击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

热情地激励人民群众起来反抗，为推翻旧社会，创造“第三样的时代”而斗争。他自豪地将自己的作品称为“遵命文学”，明确地表示自己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①。这就是说，鲁迅已经把自己的创作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比起他早期“转移性情”、“改变精神”这些比较笼统的文学主张，“遵命文学”的说法已经含有新的革命因素和具体的时代内容。鲁迅主张文艺要服从时代的需要，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服务。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创作了许多闪烁着反封建战斗锋芒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起了极大的推动和鼓舞作用。大革命失败后，鲁迅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论述文艺的性质和任务，他的认识更加明确和彻底，焕发着新的战斗的思想光彩。他在《〈艺术论〉译本序》中，通过介绍普列汉诺夫，对文艺的性质作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他认为，要知道艺术是什么，就需要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阶级间的矛盾，以怎样的形式，作用于艺术上；而站在该生产关系上的社会的艺术，又怎样地取了各别的形态，和别社会的艺术显出不同。”这就是说，“艺术也是社会现象”，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是受经济基础制约和决定的。这时的鲁迅，已完全摆脱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他明确指出，分析艺术现象，必须“从生物学到社会学去”，“必用唯物史观的立场”。

鲁迅后期的文艺思想，一直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肯定文艺是有阶级性的。他指出：任何一个作家“终

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在阶级社会中，作家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他们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⑤。因此，“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⑥作家既然是所属阶级的一员，思想感情都打上阶级的烙印，那么在反映生活时，就不能不受到一定阶级的立场、观点的制约和支配，就不能不表现一定阶级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愿望，带有阶级倾向性。鲁迅说得再透彻没有：“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的人，也就是忠实于他本阶级的作者，在资产阶级如此，在无产阶级也如此。”^⑦

文学既然有阶级性，“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⑧无产阶级文学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呢？鲁迅说得好：“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⑨，是为“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⑩。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无产阶级的“终极目的”——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服务的。鲁迅在谈到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高尔基时说：“革命的导师（指列宁——笔者），却在二十多年以前，已经知道他是新俄的伟大的艺术家，用了别一种兵器，向着同一的敌人，为了同一的目的而战斗的伙伴，他的武器——艺术的言语——是有极大的意义的。”^⑪这里说得很明白，无产阶级文艺虽然用的是艺术的语言、艺术的形象作为武器，但它同无产阶级总的斗争目标是共同的，是为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服务的。

鲁迅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和任务的看法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论述是吻合无间的。早在一九〇五年列宁就说过：

“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⑫后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这一思想，进一步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⑬这些光辉指示，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和任务，保证了革命文艺能够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健康而迅速地发展，充分发挥文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中的战斗作用。

鲁迅在后期的革命实践中，为捍卫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三十年代，许多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对无产阶级文学惊恐万状，想方设法进行诋毁，妄图用“表现基本人性的艺术”等资产阶级的货色来替代战斗的无产阶级文学。“‘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他出于反动的阶级本能，十分惧怕无产阶级利用文艺“激发无产者争斗的欲望”，为了取消无产阶级文学，他拚命地叫嚷“文学没有阶级的界限”，鼓吹“文学没有任何使命”。鲁迅对他的反动谬论给予毁灭性的打击，一针见血地指出：“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全人类’‘超阶级’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⑭。梁实秋之流不过是以“人性论”为幌子，来掩盖其文艺维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欺骗和奴役无产阶级的反动实质。这种理论本身就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鲁迅认为无产阶级应该理直气壮地公开声明文学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无产阶级文学应该“激发”无产

阶级的阶级觉悟，“促起他们的联合”，为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而且，无产阶级文学不能和资产阶级反动文学“同存共荣”，它们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战胜和驱逐资产阶级反动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才能得到发展。无产阶级文学“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在这里，鲁迅的无产阶级立场何等鲜明，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坚定而倔强的马克思主义战士的生动形象。

鲁迅不仅在理论上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学而战斗，而且在创作实践上，自觉地贯彻文学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为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战斗篇章。我们知道，杂文是鲁迅后期作战的主要武器。在当时文坛上，资产阶级往往把杂文当作个人的事业，反对讲立场、讲战斗性。周作人公然提出“叫个人的艺术复归于集团的，也不是很对的事”。林语堂则提倡杂文作家对生活要抱冷眼旁观的态度，做“冷静超远”的旁观者。与此相反，鲁迅运用杂文这种犀利的艺术武器，自觉地配合党所规定的这一时期的革命任务，根据阶级斗争的形势变化，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搏斗。如他自己所说，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代，他的杂文是刺向敌人的“匕首”和“投枪”，是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从“九·一八”以后，帝国主义的任何一个重要的侵略步骤，蒋介石反动派每一次重大的反革命阴谋，都未能逃过鲁迅杂文的锐利的笔锋。特别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只要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一露头角，鲁迅便迎上前去，把他的锋利投枪掷向敌人，给予致命一击。列宁指出：“政治揭露工作本身就是瓦解敌人制度的一种强有力的手

段”，“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⑮。鲁迅正是用他的杂文，洞烛底蕴地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反对人民、摧残革命的狰狞面目，扫荡了旧中国一切妖魔鬼怪。他用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辉，把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垃圾照得原形毕露。这些杂文充满着无产阶级战士不屈不挠的顽强彻底的革命精神，闪射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具有砍钢削铁的杀伤力量，使得敌人胆颤心寒，使得人民意气昂扬，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二

毛泽东同志说：“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⑯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但文艺并不等于政治，它们之间不能互相替代。文艺有自己的特殊性，它是用特殊的途径和手段来为政治服务的。鲁迅有一段话说得很生动、很明确：“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⑰资产阶级把文艺同政治分裂开来，把文艺说成是与政治无关的超阶级的东西，这是为鲁迅所坚决反对的。但鲁迅同时也反对抹煞文艺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因为那样做，文艺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为政治服务也就成为一句空话。鲁迅重视文艺的特殊规律，正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无产阶级文艺的战斗作用。这

同战士只有熟悉手中武器的性能和特点，才能很好地发挥其作用，以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是一个道理。

文艺的特征是什么呢？鲁迅对这个问题作了长期的研究和探索。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认为“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⑩。就是说，理论是直接诉之于人的理性的，而文学则要通过形象打动读者的感情，从而使人感奋。鲁迅对文学特征的这种正确认识，在《摩罗诗力说》中得到更加具体的阐发。鲁迅把科学和文学进行比较，指出两者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揭示生活的真理，“启人生之闷机”。文学和科学相比，“缕判条分，理密不如学术”，但文学“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在这里，鲁迅指出科学和文学反映生活的手段是不同的，因而各有特殊的社会作用。科学是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来反映生活的，因而在理论上“缕判条分”，具有高度的严密性，这是文学所不及的。然而文学是“直语其事实法则”，是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式再现生活的。文艺作品中是活生生的形象，它保留了生活的丰富性和生动性，这是科学“所不能言”的。在以后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鲁迅对艺术的特征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苟合于此，则无问外状若何，咸得谓之美术；如雕塑，绘画，文章，建筑，音乐皆是也。”这里的美术，泛指一切文学艺术。鲁迅认为构成美术的三大要素是“天物”、“思理”和“美化”。所谓“天物”，是指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和社会。所谓“思理”，是指创造性的想象。所谓“美化”，是指艺术加工和理想化。美术是“天物”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作家的艺术想象和艺术加工的。鲁迅特别重视“思理”。此语源

出刘勰的《文心雕龙》的《神思》篇。刘勰讲的“思理”，指的是艺术想象活动。他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在文艺创作中，运用“思理”——艺术想象，作家的思想可驰骋于穷高极远的空间，突破古今上下的界限，使得艺术形象更加丰满、生动而明晰。“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在艺术想象中，始终伴随着具体的形象。正是运用这种“思理”，艺术形象才能创造出来，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文艺作品是“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的意思。鲁迅对“思理”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十分强调，他说：“故作者出于思，倘其无思，即无美术。”也就是说没有“思理”，没有艺术想象，便没有文艺创作。这充分说明在鲁迅早期的文艺思想中，就非常重视和强调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

鲁迅对文艺特征的认识，同样随着他的思想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深化。在后期，他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文艺的特征作了科学的说明。他在《〈艺术论〉译本序》中，完全赞同普列汉诺夫关于“将艺术的特质，断定为感情和思想的具体底形象底表现”的看法，并进一步对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的阐明。他说：“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着意义的东西。功用由理性而被认识，但美则凭直感底能力而被认识。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学底分析而被发见。所以美底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快的根柢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并非人为美而存在，乃是美为人而存在

的”。在这段话里，鲁迅指出美是客观存在的，而人们的审美标准是根据“阶级的功利主义底见解”，看事物和现象于人们是否“有用”。文艺作品应该为革命斗争服务，具有革命的功利性。然而，这种“功用”又是“伏着”的，是通过“直接性”表现出来的。所谓“直接性”，就是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再现生活。正因为如此，所以读者接触的是具体的、可感的、渗透着作家美学理想和思想评价的艺术形象，它在使读者“凭直感底能力”认识并“享乐着美的时候”，启发读者去思考，“由理性”去认识其“功用”，从而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

恩格斯说：“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①9}文艺作品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都有一定的“功用”的目的，但这种“倾向”和“功用”应该渗透在艺术形象的描绘中，通过具体而生动的场面和情节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如果以为靠空洞的说教，把形象作为抽象概念的符号，在文艺作品中写哲学讲义才能发挥其“功用”，那就违背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这种作品不能给人以“美的享乐”，也根本达不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鲁迅对那些虚张声势、借以吓人的“教训文学”十分反感。他说：“发抒自己的意见，结果弄成带些宣传气味的了伊孛生等辈的作品，我看了倒并不发烦。但对于先有了‘宣传’两个大字的题目，然后发出议论来的文艺作品，却总有些格格不入，那不能直吞下去的模样，就和雏诵教训文学的时候相同。”^{②0}这种作品不从实际生活出发，不是让形象和

事实讲话，而是掇拾一些现成的口号、概念，发一通空洞的议论，没有真实的生活内容，自然谈不上有什么感人的艺术力量。鲁迅一向反对这种不重视文艺特征的错误倾向。早在一九二五年，鲁迅在谈到一些为五卅事件所写的诗歌时曾说：“周刊上常有极锋利肃杀的诗，其实是没有意思的，情随事迁，即味如嚼蜡。……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②鲁迅的意思很明白，不重视文艺的特征，那种理胜于情、不含蕴耐读的诗是没有艺术生命力的。二十年代末，在和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鲁迅曾一再强调作家要重视文艺的特殊规律。他尖锐地指出，那些为表示其“新兴”，而填进标语、口号的诗歌小说，“实际上并非无产文学”^③这种作品既损害了文艺，也无助于政治。鲁迅说得好：“我们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④这样的作品才有强大的艺术力量，才能真正起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作用。

鲁迅的作品是政治性和真实性，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高度统一的典范。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作了极其深刻的观察和分析，有自己独特的发现和见解。同时，他又有丰富的艺术修养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他善于让形象和事实说话，通过对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作逼真、细致的勾画，透过一幅幅现实的和历史的真实而又生动的生活画面，表现出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他的作品有力地配合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又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具有巨大的艺术

魅力。他的许多著名小说，如《阿Q正传》、《故乡》、《祝福》、《在酒楼上》、《伤逝》等都是思想性很强的精美的艺术品。他的杂文，在政治内容上“锋利而切实”，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在艺术上“生动，泼刺，有益”。既是匕首和投枪，也能给人以“愉快”和“休息”。他的诗歌不仅寄托深远，内容警辟，而且构思严谨，意境精妙，词句凝炼，音节响亮，可谓绝唱。他的散文思想深刻，笔调舒卷自如，含蓄隽永，闪耀着逗人的艺术精光。

三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文化事业，“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为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即为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而斗争的精神。”^②这就是说，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的职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并没有消失。它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

鲁迅未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未能看到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然而从他对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文学所作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热切地希望文艺要描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服务。他称赞革拉特珂夫的长篇小说《士敏土》，肯定这部“表现着工业的从寂灭中而复兴”的作品，“是新俄文学的永久的碑碣。”^③他褒扬“介绍着建设